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乐黛云 主编

問

寻觅时空最佳点

刘介民 著



文津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闻一多 寻觅时空最佳点

刘介民 著

 文津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选题策划：徐 迅 龙 杰
责任编辑：欧阳向英 于海岩
责任印制：李文宗
封面设计：张守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闻一多 寻觅时空最佳点 / 刘介民著. —北京：文津出版社，
2004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 乐黛云主编)

ISBN 7-80554-447-6

I. 闻… II. 刘… III. 闻一多(1899~1946)—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2765 号

·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

闻一多 寻觅时空最佳点

WEN YIDUO XUNMI SHIKONG ZUIJIADIAN

乐黛云 主编 刘介民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文 津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1230 32 开本 11.125 印张 289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80554-447-6

K·61 定价：23.00 元

总 序

乐黛云

21 世纪，世界文化正面临一个新的转折。为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必须大力推进多极制衡和文化的多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必然成为世界新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以利于其现代发展并有益于世界进步；另一方面又亟须总结过去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对百年现代文化进行总结，以便为建构未来的世界新文化作出贡献。这一总结的核心无疑是百年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激荡及其酿成的发展趋势。

百年中国比较文学正是在这一历史使命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20 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中外学术的冲突和融通中曲折地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深刻而独特的足迹。比较文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首先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决定了 20 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百年中外文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



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百年来，已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但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多局限于西方文化对中国学者和作家的影响，少有研究这种影响如何在中国文化自身传承之中发生和发展，更少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得到新的诠释而促成自身的现代化。本丛书从这一现实状况和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20世纪一百年来卓有成就的中国学术名家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形成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化，进行全面的总体探讨和深入研究；并在这一基础上探讨继承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以及多元文化交汇共存的规律，目的在于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今后的发展方向，以便中国文化真正能作为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古今文化承接和中西文化沟通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学术界至今较多关于这方面的一般理论探讨，较少有将中西会通和古今传承二者结合起来的、有分量的重点个案分析。本丛书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沟通中西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卓有贡献的中国学术名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汇的坐标上，完整地阐述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及其对中外学术发展的贡献。特别着重探讨20世纪一百年来他们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形成完全不同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景观。着重个案研究，意在通过主要人物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突出他们对中外学术发展的独特贡献，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力图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国内跨文化研究和现代文学方面著述颇丰的一流专家学者，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研究功力，是继20世纪

初沟通中西文化的钱钟书、季羨林等大家之后涌现出来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基本上做到了名家写名人，研究有深度，叙述到位，资料翔实，视角独特。

总之，本丛书进行的这种研究不仅对中国极为重要，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也具有突出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本丛书志在这方面填补学术界的空白。

目 录

前言 在古今中西的文化坐标上	(1)
一、跨文化质素的逻辑起点	(2)
二、多元文化观与承继纳新	(5)
三、沟通中西文化的契合点	(13)
第一章 中西艺术的宁馨儿	(18)
一、两种文化的滋润哺育	(18)
二、两种观念的接受传播	(37)
三、“纳西方诗于艺术之轨”	(48)
第二章 异质文化的探索者	(62)
一、从信仰到意象的追求	(62)
二、由画到诗的艰难转变	(75)
三、艺术是文化交流之桥	(89)
第三章 文化思想的开拓者	(108)
一、沟通融会传统与现代	(108)
二、改造和重铸文化性格	(118)
三、唯美主义的文化倾向	(127)
第四章 诗与学术的审美者	(136)
一、艺术人生的美学思考	(137)
二、艺术探索的民族特色	(143)
三、艺术生活的审美批评	(149)

第五章 新诗理论的开创者	(155)
一、新诗“格律”的理论	(156)
二、域外诗学理论的影响	(169)
三、精神与形体调和的美	(179)
第六章 新诗创作的巨擘	(195)
一、新格律诗的艺术内涵	(195)
二、诗歌创作的文化特征	(211)
三、凝重精练的语言艺术	(221)
第七章 学者的书斋生涯	(233)
一、回归古籍的学术研究	(234)
二、神话与民族源头	(247)
三、《诗经》研究的比较方法	(257)
四、《楚辞》考证与思辨	(271)
五、《周易》与卜筮天象	(279)
六、《庄子》与文学审美	(286)
七、唐诗研究与唐文化	(293)
八、文学史的文化源头	(301)
第八章 感时忧国人生路	(311)
一、请命者的号角	(311)
二、殉道者的精神	(319)
三、不幸遇刺而亡	(325)
参考文献	(332)
闻一多主要著述年表	(338)
后记	(346)



前言 在古今中西的文化坐标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各种思潮涌进中国，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西学的输入，对中国的荣辱和兴衰关系重大。闻一多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挑战。他们必须面对外国文化输入给中国的影响，并且做出抉择。他们也必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评价，对人生的价值、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出路进行再思考。先进的知识分子普遍欢迎外来文化，普遍认为不吸收便不能救中国。虽然当时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东方优于精神文明，西方胜于物质文明”等种种论调，但大多数有识之士都力图摆脱传统的束缚，汲取外来文化，弃旧纳新。闻一多的意义在于他坚持传统文化操守，站在 20 世纪人类思想发展的制高点，以世界眼光俯瞰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独辟蹊径，寻觅时空最佳点，开中国诗学现代化的先河。

闻一多在清华学校学习长达十年，学校所采取的独特的双语教学方式，奠定了他在西学、国学两方面的基础。闻一多的跨文化个性特征、学术修养和价值观念等特有的素质，是他中西文化观、人生价值观和为人处世观形成的逻辑起点。五四以来，把跨文化的视角引进研究领域的学者不止闻一多一人，但在认同与融合、沟通中西文化的坐标上，闻一多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以下将从闻一多跨文化素质的逻辑起点、多元文化观与承继纳新、沟通中西文化的契合点三个方面，探讨他在中国现代学术上的贡献。

一、跨文化质素的逻辑起点

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化启蒙运动蓬勃发展。在当时政治文化影响下的闻一多，接受了爱国、民主和人权观念的洗礼，更加痛恨专制主义。闻一多所接受的是“中西合璧”和“多元并蓄”的教育，这培养了他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1916年6月，他在清华学校听完美籍教员力绮萨讲述美国大学毕业典礼的情况后，撰写了《美国学校毕业典礼之一斑》，在其序文中指出：

其毕业、升学之典，在有所闻奈失之庞樊，莫由稽考。洎后王失政，教育薜暴，学校寝衰，科举制作，士子惟于应试时仅覩面。常日黄卷青灯，株守牖下，与古人相对，与世人无缘，致埋首闭户，而以勤称，奚怪其孤陋寡闻而遗讥鼠目也。

稽欧美各邦，每视学校毕业为重典，其风俗有大别于吾人者。故学者幼而同学，有朋友丽泽之益；长而共事，有明良翼赞之功。其所裨益，顾不巨欤！^①

上述序文反映了年仅十七岁的闻一多在接受西方文化过程中对西方文明的神往。在清华学校，他还经常参加全校性的中英文辩论、演讲、学术讨论会及其他多种社团的工作。如1917年英文论辩会题目“今日中国科学家较文学家为要”，闻一多担任反方助辩。1920年，闻一多在《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一文中，提出中西艺术融合的观点，他说：

^① 闻一多：《美国学校毕业典礼之一斑》，见《闻一多全集》，第2卷，28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我们谈到艺术的时候，应该把脑筋里原有的一个旧艺术底印象扫去，换上一个新的，理想的艺术底想像。这个艺术不是西方现有的艺术，更不是中国的偏枯腐朽的艺术底僵尸，乃是融合两派底精华底结晶体。^①

这里所说的艺术“加入”西方文化，“融合”为一种“精华底结晶体”，成为“世界的资产”，就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西文化中所谓审美教育的一种理论，可以说，闻一多相当敏锐地把握到了当时世界思潮的大趋势。他说：“托尔斯泰希望于艺术的是一种人类情同手足的团结底实现，康德（Kant）、费希特（Fichte）都说艺术是介于实体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做他们的桥梁的。换言之，前者是讲艺术可以促进人类的友谊，后者是讲艺术可以抬高生活的程度——这就是艺术的功用。利用人类内部的、自动的势力来促进人类的友谊，抬高社会的程度——这才是社会的真价值。”闻一多如此来理解中西文化价值及其功能，也许未免有些幼稚，但他感觉到了时代的律动，这是闻一多精神结构中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起点。

闻一多的文学活动也相当频繁，如1921年12月，小说组讨论“小说发达史”，他的题目是“汉姆生（K. Hamsun）之生平及作品”。在文学社第六次常会上，他还参与讨论了“文学与文人”、“Wordsworth, Coleridge, Scott的诗”。^② 这些活动都培养和锻炼了闻一多的跨文化质素和中西文化认同与融合、沟通中西文化的能力。

闻一多崇尚民主和自由、反对专制和独裁的价值理想倾向的形成，可以说主要是来自西方思想的影响，而这也自然成为他跨文化质素的逻辑起点。1921年，闻一多在清华接受基督教洗礼，

① 闻一多：《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见《闻一多全集》，第2卷，1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② 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152—15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Wordsworth即华兹华斯，Coleridge即柯勒律治，Scott即骚塞——笔者按。

据他的同学吴泽霖回忆：

关于基督教的事，我们几个知己的朋友态度几乎是一致的。我们都读过《圣经》，对上帝如何创造宇宙、创造人的故事，我们都不信，认为是迷信。但宇宙万物能构成一个有条不紊的巨大体系，都感到万分惊异，带有不可知论的态度。至于基督教的善恶、道德观、与人为善、服务社会、平等待人等等思想，我们都认为人人都应信奉而加以扩散。我们都在海淀的一个中国教堂里正式接受过洗礼，在我们看来，洗礼等于宣誓，表示对这些教义深信不疑而且愿意身体力行。但我们并不相信教堂里那些迷信性质的仪式，同时我们认为基督教教义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结合中国情况而进行宣传，无须由外国传教士来包办一切。“入教应在中国教堂由中国牧师施洗礼”是原话，我们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①

《圣经》是体现西方文化基本价值理念的重要著作，基督教则是实现这一教义的最重要西方思想载体之一，也是闻一多用来评价中国现实的一个依据。他从改革中国、汲取外来文化的角度，接受西方文化理念，表现了他崇尚自由、平等、民主，反对专制、服务社会的一种崇高理想和决心。闻一多也为此奋斗了一生。

接受基督教洗礼本身是一种价值理想层面上的象征性事件，而闻一多却在自己的行动中实践着这一理想。无论是1917年为同学弃学参战的义举喊出“爱国无罪”，1919年的五四运动“称明大义”，还是1921年在“上社”会议上大骂桂系军阀，声援“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罢教斗争，“被开除学籍在所不惜”都可以说是闻一多为理想而献身的悲剧命运的预演。1921年11月，闻一多针对学生中激愤有余而理性不足的思潮，撰写了《恢复和平》

^① 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12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一文，他说：

社会的幸福建于秩序与和平的基础上。所以他的秩序将破则维持，既破则恢复才是我们的天职。爱和平重秩序，是我们中国民族底天性。我们不愿意我们青年一味地眩于西方文化的新奇，便将全身做了他的牺牲。^①

这里，闻一多所说“西方文化的新奇”，是指当时“俄罗斯底赤色在中国的影响”：“我们要快把那不受缰锁的，安那其的（Anarchical）浮躁野蛮的‘赤’气摆脱，三熏三沐降心屏息地整顾大局。”当时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属于西方文化范畴的跨文化的问题。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闻一多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若要挽回这种狂澜，没有别的方法，全在我们善于驱使理智节制感情。换言之，我们的头脑都太热了，若能少任血性，多用考虑，便不致有这种毛病。”可见，早在清华时期，他的跨文化质素的逻辑起点就已经确立了。

二、多元文化观与承继纳新

闻一多认为中西文化有差异而无对立，这是他跨文化质素的又一个显著特征。但他把中西文化价值观中侧重精神和理想的层面与现实中那颓唐、靡朽的风尚对立起来，以致造成了在追求典雅趣味、崇尚格律形式与不能忘情于现实的文化情调之间的不可协调矛盾。而这种将现实矛盾转化为审美观照的文化态度，使闻一多充满了沉郁和激奋，也正是这一态度，使他把目光转向传统文化，以理性的心态为国家、民族及其文化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① 闻一多：《恢复和平》，见《闻一多全集》，第2卷，33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也使其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研究充满了生命力度。

闻一多认为，中国文化在周代就已经相对定型了。他认为，中国文化首先具有兼收并蓄的统一性，然后才是区域性，而且它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他以其多元的文化视角，具体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以及弗洛伊德的学说等，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例如《伏羲考》和《龙凤》等文章，都是从人类起源和文化起源的角度，进行诠释考证的。他研究古代神话的对象不在查明过去神话中的历史人物，而在衡量这些神话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这种诠释考证，在文化史上有助于对中国文化原始的表现形态、中国文化生命里最基本的观念形态的探索。例如，他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认为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灵之物，是华夏民族尊奉的一种图腾。龙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闻一多的回答是：“他是一种图腾，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他从七个方面考证“夏封伏羲之后”，禹与伏羲原是一家人，伏羲的图腾是龙，那么禹的图腾也就是龙。夏为龙族，所以，龙族的诸夏文化是我们的本位文化，千百年来，华夏历代帝王自称是龙的化身，而中国人称自己是太古而来的龙的传人。闻一多从人类学的角度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人类学可供我们的材料，似乎是无限度的。”而在《龙凤》一文中，他提出把“龙凤”二字，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认为：“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与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种神话中，我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①直到今天，龙作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图腾，成为中国人的永久的

^① 闻一多：《龙凤》，见《闻一多全集》，第3卷，15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象征。闻一多从人类学的角度证明，中华民族是本地众多民族合力创造出来的，而不像西方罗马文化接受希腊文化，日本文化接受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那样主要受外来文化影响。中国文化的原始精神，就是这样一种依附存在、缺乏自由意识的本位文化。

中国文化是多元的，闻一多对此有很多精辟论述。例如在《复古的空气》一文中，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复古空气活跃的原因和动机。一是与外人接触，发现给予民族精神生活的担负，实在是太重了；二是凡是与外人接触较多的人，自然也就是饱尝屈辱经验的人；三是不少外国朋友捧起中国来，直使我们茫然，不料真有人盲从别人来捧自己，因而大干起复古的勾当来；四是一些“老先生”专门搬弄些“假古董”在国际市场上吸收外汇。于是他总结说：

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所以能存在到今天，自然有其生存的道理在，这道理并不像你所想的，在能保存古的，而是正相反，在能吸收新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成不变的文化。（如果是那样的，它早完了）最初东西夷夏两民族，分明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文化。^①

他认为，如果站在东方，以夷（殷人及东夷）为本位，那便是夷吸收了夏；如果站在西方，以夏（夏、周）为本位，那便是夏吸收了夷。但是这两个文化早已融合到一定程度，使得我们分辨不出谁是主、谁是客。一个民族的“古”是在他们的血液里，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要取消它的“古”是不容易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吸收新的，因为文化有惰性，而愈老的文化惰性也愈大，克服惰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如何继承

^① 闻一多：《复古的空气》，见《闻一多全集》，第2卷，33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传统、吐故纳新，掌握文化的价值取向，是闻一多十分关注的。

在古今中西的文化坐标上，闻一多主要探讨了几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第一，周秦儒、道、墨、法几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和贡献。他先后发表《什么是儒家》、《道教的精神》、《关于儒·道·土匪》等文章，论述了儒、道、墨、法各派的理念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影响。他认为，一些封建买办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小背“子曰诗云”，耳濡目染，中毒太深。认为“儒家思想，正如上文所说，是奴隶社会的产物，而它本身又是拥护奴隶社会的”。他们反对人民革命，一心想倒退。在国民党整天骂共产党为土匪时，闻一多在《关于儒·道·土匪》一文中说“土匪最老实”，土匪的前身“动机也最光明”，并进一步指出：“如今不但在国内，偷儿，骗子在儒道的旗子下，天天剿匪，连国外的人士也随声附和的口诛笔伐，这实在欠公允。”闻一多从文化学的角度，阐述了上述各派理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它们在文化上的地位。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精神，如家族血缘关系、以孝道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宗法制度等，都是从儒、道、墨、法等各家的理念中产生的。正是这周秦文化维护了奴隶社会，也成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按照闻一多的说法，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过汉代董仲舒的修正、神化，最后成为以治家之道治天下，实现了所谓“天下一家”的思想。他认为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是一个居于矛盾的两极之间的缓冲阶层的后备军”，是站在“主奴”之间，各打五十大板，息事宁人。这种富有思辨色彩的议论，给人以极大的启发。他在《什么是儒家》中忠告人们：“切莫误会，中庸绝不是公平。公平是从是非观点出发的，而中庸只是在利害中打算盘。主奴之间还讲什么是非呢？”^①

^① 闻一多：《什么是儒家》，见《闻一多全集》，第2卷，39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这就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儒家提倡“中庸之道”的本质。

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阴阳家、墨家也作了分析，认为老庄的著作充满神秘思想，具有宗教精神。从灵魂不死的观念来看儒、道两家，似乎儒家所谓“死人不死”，是形骸不死，道家则认为灵魂不死。形骸不死，所以要厚葬；灵魂不死，则“羸葬以反真”。他说像《庄子·内篇》中的《齐物论》等，绝不是一般的寓言，应有它特殊的涵义。庄子的所谓“神人”、“真人”，是“人”的本然的超越性所具有的能力，而现实的人是被后天的道德仁义所戕害的人。他在《道教的精神》中说：

我们只要记得灵魂不死的信念，是宗教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对庄子这套思想，便不觉得离奇了。他所谓“神人”或“真人”，实即人格化了的灵魂。所谓“道”或“天”实即“灵魂”的代替字。灵魂是不生不灭的，是生命的本体，所以是真的，因之，反过来这肉体的存在便是假的。真的是“天”，假的是“人”。^①

这里，闻一多认为，道家或道教的思想是从宗教迷信、灵魂不灭的观念推衍出来的，庄子的思想中就充满了宗教观念。闻一多开始很赞赏充满神秘色彩的庄子思想，可后来，他的态度改变了，扬弃了庄子。闻一多在《关于儒·道·土匪》一文中将“儒家、道家、土匪”，改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儿、骗子、土匪”，并引用韩非的名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来说明。他指出：“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文章深刻鞭挞了那些“身在魏阙，心在江湖”和“大隐隐朝市”

① 闻一多：《道教的精神》，见《闻一多全集》，第9卷，44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